In the Company of the Wise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and Critics

單德興 著

與智者為伍

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

辭海中的好兵：哈金　獻身書寫與和平的女勇士：湯亭亭　「轉鳳」：梁志英

想像・書寫・越界：山下凱倫　華美・文學・越界：黃秀玲

於亞美研究中興風作浪：金惠經　再現美洲華人史：陳國維

歷史・知識論・社會責任：高木羅納

文學・「運動」・文化：勞特

港台书

In the Company of the Wise

Conversations with Asian American Writers and Critics

單德興 著

與智者為伍

亞美文學與文化名家訪談錄

辭海中的好兵：哈金　獻身書寫與和平的女勇士：湯亭亭　「轉風」：梁志英

想像・書寫・越界：山下凱倫　華美・文學・越界：黃秀玲

於亞美研究中興風作浪：金惠經　再現美洲華人史：陳國維

歷史・知識論・社會責任：高木羅納

文學・「運動」・文化：勞特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

智慧的饗宴：

《與智者為伍》推薦序

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即使在學術訓練的過程中受到新批評以文本內緣研究為尊以及後結構主義質疑「作者」存在的理論影響，我仍然深信在創作的過程中，「作者」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能夠充分掌握文本創作的背景與過程，對於我個人的研究而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此也格外重視創作文本之外的「第一手資料」，像是作者對於創作理念的自述或是訪談文章。回顧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幫助我認識非裔美國女作家莫理生（Toni Morrison）的老師費德曼（Susan S. Friedman）與馬凱（Nellie McKay）教授都與訪談淵源甚深。馬凱老師出版了學術界第一本莫理生的訪談選集，費德曼老師則在莫理生專題的讀本裡提供了大量她所蒐集的訪談與作者自述文章。我對於莫理生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生平與思想能了解些許皮毛，受到恩師對於訪談文章的重視極大的啓發。正因如此，我一直相當喜愛閱讀學術訪談這個次文類（subgenre），對於訪談人更抱持極大的敬意。

實際上，作為一個優秀的學術訪談人所要做的準備功課極為繁複，不但要熟讀受訪者的作品，還要徵得受訪者的首肯，並且能夠獲得對方的充分信任，各種外在與內在條件皆需因緣俱足，方可造就訪談者與受訪者兩造開懷暢談的機會。因此，要能夠寫出一篇好的訪談文章，可能比閉門造車地撰寫學術論文還要困難許多。就社會影響層面而言，訪談

的傳播力量也比學術論文更加廣泛，不僅僅是學界珍貴的研究資料，許多非學術研究專業的讀者也能透過訪談對話得以親近自己心儀已久的作家或學者。

談到台灣的學術訪談著述，單德興先生絕對是箇中翹楚。回顧單先生與訪談文類的因緣，由翻譯到自行擔任訪談人，進行訪談工作的經驗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透過他純熟的訪談技巧與精確的提問，讀者得以聆聽諸多國際重要學者與作家對於他們的著作或是學術生涯做最個人化的陳述或反思，也因此更能了解文學作品產生的機緣與學術思路的進程。同時，作為一位傑出的學者，單先生對於訪談文類的貢獻還包括他對於這個次文類所進行的理論化的探索。例如他在翻譯的《英美名作家訪談錄》的〈出版說明〉中，將訪談者比喻為讀者與作者之間互通訊息的「代言人」，一方面代表讀者提問，另一方面轉述作者的言談（2）。在《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的〈緒論〉裡，他從訪談作為一種「再現」形式的「藝術、政治與倫理」不同面向，對於訪談作為「在特定歷史脈絡下所產生的新的對話（dialogue）方式」作了學術性的思考（15）。在這本《與智者為伍》的前言，單先生提出訪談是「與智者為伍」的說法更是深得我心。一本訪談錄的確集結了智者之思，讓與作者緣慳一面的讀者能夠讀到／聽到智者之言，分享在對話中所撞擊萌生的智慧火花。

加拿大導演訪談集的編者梅林克（George Melnyk）認為訪談作為一種研究的質詰形式利弊參半。好處包括可以讀到口語式的自發性表達，接觸不為人知的個人經驗，了解創作計畫衍生的過程，在論及受訪人創作生涯中重大議題時可以感受到鮮活的情緒反應等等。至於訪談文章的缺點，則主

要來自於訪談人是否夠專業，或是受訪人是否夠坦誠，而且就像攝影一樣，不同的當下或有不同的影像呈現，所以訪談文章的水平也往往參差不齊（vii）。其實我認為梅林克所謂的缺點部分，正是因緣未能俱足之故，而這種訪談成果的不確定性，原本就是訪談者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倒是梅林克提及攝影這個視覺化的比喻，為訪談文類原本傾向聲音方面的探討增添了更多層次的可能性。

我在閱讀《與智者為伍》時最深刻的感受也來自於視覺化的層面，深深覺得透過這本訪談錄的文字呈現，彷彿可以「看見」每位受訪人的「神韻」。這種感官性的親切與孰悉，並非單純是因為我在亞美文學與文化方面的研究背景，或是曾經拜讀過受訪者的著作，而是因為單先生豐富的訪談經驗，使得受訪者都能敞開心胸侃侃而談，毫不吝嗇地分享他們的智慧。透過《與智者為伍》的九篇訪談文章，每位受訪人的創作理念、宗教信仰、學術養成、奮鬥過程、乃至於個人風格都躍然紙上，讓人讀來有如親歷現場。我們可以「看到」哈金對於創作語言的探索與離散身分的掙扎；湯亭亭對於和平與書寫的堅定信念與入世佛教的身體力行；梁志英對於身為亞美作家與期刊編輯不同位置的思考以及佛教對於他個人創作的影響；山下凱倫對於不同地域之日裔認同的探究與魔幻寫實書寫的定義；黃秀玲對於文學與亞美研究的堅持與謙和的個性；金惠經在夾縫的空間與主體性中尋找自我定位的過程以及直率甚且近乎叛逆的性格；陳國維對於華埠文物檔案保存與建構博物館的專心奉獻；高木羅納為了大眾讀者撰寫歷史著作而致力發展「敘事寫作」新風格的努力；勞特數十年以來由體制外邊緣地帶的抗議者成為「圈內人的領導者」的角色演變，以及他致力以負責任的心態行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權威的決心與實踐。簡言之，《與智者為伍》不但讓我們看到受訪者最真實、個人化的一面，也感受到知識分子所不可或缺的良知良能，也難怪這些文章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做一個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的知識分子」（Antonio Gramsci, "organic intellectual"）。

我非常榮幸能為《與智者為伍》撰寫推薦序，更要藉此機會為華文學界感謝單先生如此努力地深耕訪談文類。多年以來，他為我們記錄了許多智者的聲音與身影，他自己更可謂是智者最佳的夥伴，以豐富的學養與深刻的觀察引導出受訪者的真心真語以及創造知識分享的機會，實踐了入世佛教的真義以及有機知識分子的責任，讓有幸的讀者得以享受《與智者為伍》這般精采而豐盛的智慧饗宴。就佛家的觀點而言，像單先生這樣持續傳播金玉良言、利益有情衆生的訪談者，真是持散一切功德之花，佈施智慧的功德無量。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馮品佳

參考書目

單德興。《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台北：麥田，2001。

單德興譯。《英美名作家訪談錄》。台北：書林，1986。

Melnyk, George. "Introduction." *The Young, the Restless and the Dead: Interviews with Canadian Filmmakers.* Ed. George Melnyk. Waterloo, Canada: Wilfrid Laurier UP, 2008. vii-xiv.

與智者為伍：

我的訪談因緣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初，我接到好友李有成教授傳來一篇文章，名叫〈被惡鬼追趕〉（"Driven by Demons"）。聳動的標題立即吸引我的注意。原來這是土耳其小說家、二〇〇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在英國《衛報》上發表的文章，內容有關他與訪談錄的因緣。文中提到，三十年前，年方二十五的帕慕克為了一圓作家夢，離開當時就讀的建築學校，與母親住在伊斯坦堡一間可以俯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公寓裡，正和生平第一本長篇小說奮鬥。既無土耳其作家朋友，又對第一部作品充滿不確定感，閉門寫作的帕慕克內心的孤單與焦慮可想而知，不時思索著「我現在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就是在如此焦慮不安、孤立無援的情境下，他首次讀到《巴黎評論》（*Paris Review*）上的美國小說家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訪談錄，頓覺「振奮，彷彿無意間發現了一個神聖的文本」。帕慕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讓他印象極為深刻的一段話。在回答要如何成為嚴肅的小說家時，福克納這位一九四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

> 百分之九十九的才華……百分之九十九的紀律……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必須對自己的成果永遠不滿意，自己的作品永遠可以寫得更好，要求要有超乎自己水準的表

現。不要只求勝過同輩或前人，要嘗試超越自己。藝術家的身後都有一群惡鬼在追趕。他不知道為什麼惡鬼找上了他，通常也沒時間去思索其中的原因。只要能夠完成作品，不惜去搶、去借、去求、去偷，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作家唯一該做的就是對自己的藝術負責。[1]

（《文學心路》207）

這些文字讓帕慕克大受鼓舞，於是設法取得企鵝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巴黎評論》訪談集，專心閱讀，盡情享受，尤其是當寫作遇到瓶頸時，更是以讀這些訪談錄解困，「奮力重拾對寫作的信心，尋找自己的路」，因為在那些訪談錄中，作家們「談論自己的寫作習慣，這一行的祕密，寫作的方式，脆弱的時刻，以及克服困難的方式。我需要儘快地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也就是從這些前輩作家的訪談中，帕慕克發現在寫作之路上自己並非踽踽獨行，而是有許許多多的前行者引領、伴隨，這些人與他有著同樣的熱情，類似的遭遇，但終能堅守初衷，咬緊牙關，克服困難，成為眾所仰慕的作家。

帕慕克在文末提到，在早年的作家生涯中，他經常重讀這些訪談來「堅定自己的決心」，即使多年後自己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再讀這些訪談依然讓他憶起昔日的「希望與焦慮」，甚至「比以往更強烈訴說了文學的歡樂與煩惱」。

一個月之後，我因為開會走訪哈佛大學，有一天信步來

[1] 福克納訪談錄全文，可參閱我所編譯的《文學心路：英美名家訪談錄》（台北：書林，1998），頁203-26（原《英美名作家訪談錄》〔台北：書林，1986〕，頁227-50）。

到當年經常駐足的哈佛書店，看到醒目處矗立著書店特別推薦的幾本新書，其中之一就是《巴黎評論訪談錄，第二輯》（*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II*）。我出於好奇，從書架取下，隨手翻開，赫然發現序言正是帕慕克那篇文章，裡面收錄的作家訪談錄有些是我曾經閱讀與翻譯過的，當然也包括了福克納那篇訪談錄，頓時讓我回想起自己與訪談的深厚因緣。

大約也是在一九八〇年左右，我讀到《巴黎評論》的訪談錄，深深為其內容所折服，不僅因為訪談對象為多位名作家，更因為內容精采、深入，於是便從企鵝出版社的幾本訪談錄中精挑細選了十六位作家（七位詩人，七位小說家，兩位劇作家，其中包括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花了幾年時間進行編譯（其中幾篇初稿出自朱錦華先生之手），並且蒐集了一些資料為作家撰寫小傳，附於每篇訪談錄之前，幾經周折，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出版。我在《文學之路》前言中對身為代言人的訪談者有如下的說法：

> 在這裡「代言人」的意義是雙重的：他們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傳聲筒，雙方藉著這具傳聲筒互通訊息。這些訪問者本身便是熱誠的讀者，對作品耳熟能詳，對一般讀者心理瞭若指掌，他們一方面「代」表讀者發「言」，請教作家眾人亟欲知道的問題；另一方面，藉著他們高超的採訪技巧，作家得以暢所欲言，輯為訪談錄，「代」替作者發「言」。在此一問一答中，訪者當面請益，盤根問底；答者現身說法，咳唾成珠；讀者眼見問答雙方你來我往，又覺自己內心疑團一一化解，真是不亦快哉！此外，今日的紀錄就是明日的史料，所以不論

中外，作家訪談錄對作者、讀者、訪者、甚至未來的文學史家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們認為此時此地譯介外國文學名家訪談錄，對國內作者、訪者或讀者來說，兼具增長見聞及切磋攻錯之效。(4)

當年我純粹抱著與讀者分享的心態翻譯這本書，雖然相信好書必將引發共鳴，但對於會有些什麼影響卻完全不清楚。二〇〇二年我遊學紐約，在法拉盛的一家大陸書店裡看到一本簡體字版的世界名作家訪談集，翻閱時赫然發現，其中有將近一半的內容來自我編譯的那本訪談錄，讓我不禁既驚、又喜、且愕：驚的是竟會在萬里之外的異國看到自己的譯文以簡體字面貌示人；喜的是自己的譯作不僅在大陸改頭換面出版，而且流傳海外；愕的是雖然盜版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恭維」，但身為譯者的我不僅毫不知情，翻遍全書也找不著譯者的名字。後來有一次走訪中國大陸，在書店裡發現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訪談集中，第一篇就收錄了我翻譯的艾略特訪談錄，雖然附上譯者姓名，卻從未與我聯繫。儘管如此，這些事實至少證明了在華文世界裡同樣有人欣賞這些訪談錄。

其實，《巴黎評論》的訪談錄多少是個歷史的偶然。該文藝雜誌創刊於一九五三年，當時為了打響名氣並撙節開支，便想出了名家訪談的點子，第一位洽商的是英國名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佛斯特也接受了年輕編者的邀請，唯一條件是整理出的訪談稿必須經他本人過目，從此立下了《巴黎評論》訪談錄的標準作業模式，多年來建立起卓越的聲譽，成為該雜誌的特色。如果說帕慕克從《巴黎評論》訪談錄中得到的是「安慰和鼓舞」(如同《衛報》所

言），以及堅持個人的寫作習慣（多年來在方格紙上用手寫稿，與湯瑪斯．曼和沙特一樣），那麼我從中學到的就是訪談的態度與方法，以及海明威的一個寫作習慣——不是像他那樣站著寫作，而是每天在知道該如何往下寫時擱筆，以便次日接續前文。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開始做起訪談來。

我初次進行訪談是在一九八三年，那時已經翻譯《巴黎評論》訪談錄數載，訪問的對象則是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的老師——小說家王文興。當時我就讀台大外國語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三年級，專攻比較文學，要在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討論他的作品，由於廣泛閱讀他的作品，發現有些問題在書面資料中找不到任何答案，於是有意找當事人進行深度訪談，一探究竟。一向態度嚴謹、不輕易參與任何活動的王老師答應接受我的訪談，讓我喜出望外，心想即使自己的論文寫不好，但光是訪談本身就有其價值。當時我心目中的範本就是《巴黎評論》的訪談錄，巧的是，王老師也讀過它的一些訪談錄，而且有相當高的評價。

訪談當天我帶著一大疊小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寫著要請教他的一個問題，事先分門別類，重點之一就是出身外文系的他與西洋文學的淵源，以及如何將西洋文學的技巧與典故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中。訪談時我依卡片先後順序一一就教，王老師則以他一向穩重、和緩、低沉、磁性的聲音仔細應答，現身說法，回答了我所有的問題。回去後，我根據錄音帶謄寫在稿紙上，送請王老師修訂，他則逐字逐句仔細修訂。我後來閱讀他的作品及相關資料時又有新問題，於是安排進行第二次訪談，再次謄寫並請他修訂，然後在余麗娜小姐（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內人）協助下，將兩次訪談合併，全長逾三萬字，英文節本一九八四年九月發表於美國科羅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多大學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創刊號，中文全稿則刊登於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的《聯合文學》，直到目前都還是有關小說家王文興最詳細的訪談之一。多年後我將珍藏的原稿奉還王老師，由他轉贈給台大圖書館典藏。

總之，我初次訪談便取法乎上，日後也一直採取相同的作業模式，訪談的對象都與我的研究主題相關，兩者相輔相成，甚至有些訪談的價值可能還超過我撰寫的相關學術論文。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主要在美國文學，尤其是華美文學，所以訪談對象也多以這方面為主，二十五年來訪問不下數十人，已經整理發表的計有二十七人次，包括作家、批評家、理論家、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王文興（兩次）、黃玉雪（Jade Snow Wong）、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兩次）、任璧蓮（Gish Jen）、林永得（Wing Tek Lum）、梁志英（Russell Leong）、山下凱倫（Karen Tei Yamashita）、哈金（Ha Jin）、張敬珏（King-Kok Cheung）、麥禮謙（Him Mark Lai）、高木羅納（Ronald Takaki）、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金惠經（Elaine Kim）、艾理特（Emory Elliott）、柏柯維奇（Sacvan Bercovitch）、克魯帕特（Arnold Krupat）、米樂（J. Hillis Miller，兩次）、伊哲（Wolfgang Iser，兩次）、柯理格（Murray Krieger）、勞特（Paul Lauter）、薩依德（Edward W. Said，三次）。

從事訪談多年，而且受訪的對象絕大多數為外籍人士，背景不一，讓我深切體認到訪談涉及諸多複雜因素，箇中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運作空間。先前將訪談結集出版時，之所以將書名取為《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麥田，2001），是因為我一直認為訪談是一種文類

（genre）或次文類（subgenre），特色在於它是主訪者與受訪者雙方互動、交流的結果，這一方面符合了包姆在《論對話》（David Bohm, *On Dialogue*）中對於「對話」所下的定義：「在對話中，每個人並非要**使人接受**自己已知的某些觀念或資訊；相反地，可以說是兩個人**共同**做某事，也就是說，共同創造某個新事物。」另一方面也符合了米勒、克魯特與哈吉在《專業訪談》（Rob Miller, Valerie Crute, and Owen Hargie, *Professional Interviewing*）中對於「訪談」的定義：「〔訪談是〕一種面對面的雙向互動，其中一人扮演訪問者的角色，另一人扮演受訪者的角色，此二角色對於行為與態度的方式都有清楚的期盼。其中一位參與者為了特定目的要求訪談，兩位參與者都有心貢獻。」

為了替自己解惑，一探這個特殊、迷人的文類或次文類，所以在《對話與交流》準備出版時，我全面校讀收錄的十八篇訪談，重溫昔日的一些感受與想法，利用當時在英國伯明罕大學從事一年研究之便，蒐集了一些資料，把這些年來的訪談經驗，綜合相關看法，寫了一篇長序〈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深入探討縈繞心頭多年的問題。

正如前述，訪談就是代言，同時也是再現。細究之下，其中涉及三個重要面向：藝術、政治與倫理。首先，訪談必須有一定的文采和組織，否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所以涉及藝術。其次，訪談涉及主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其中有合作、妥協、角力、甚或針鋒相對，因此又與政治有關。最後，在再現訪談時，尤其是再現那些無法閱讀中文的外籍人士時，主訪者就是他們在華文世界的再現者或代言人，有責任與義務忠實呈現受訪者，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說法硬套或暗扣到他們頭上，所以又涉及倫理。近年

來，陸續有海峽兩岸的期刊邀請我接受訪談，形式不一，有當面的、也有書面的，有綜合報導式的、也有一問一答式的，讓我能從受訪者的角度體會與反思訪談，了解他們的關切與期盼，更確認了藝術、政治與倫理確為訪談的重要面向。

本書收錄了自前書出版之後整理完成的九篇訪談錄。每一篇都以同樣嚴謹的態度與方法進行，在主題上則集中於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其中四篇（山下凱倫、黃秀玲、金惠經、高木羅納）為二〇〇五年八月至二〇〇六年八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一年研究訪問時進行的。這些訪談對象有作家（哈金、湯亭亭、梁志英、山下凱倫）、批評家（黃秀玲、金惠經）和歷史學家（陳國維〔John Kuo Wei Tchen〕、高木羅納），都是在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方面開疆闢土、卓有貢獻的人士。

哈金是以非母語的英文創作獲得最多美國重要文學獎項的華美作家；湯亭亭自一九七〇年代便崛起於美國文壇，多年創作不懈，十多年來更帶領退伍軍人寫作坊，以具體的行動投入和平運動，並榮獲二〇〇八年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章；梁志英不僅身兼詩人和作家的身分，而且多年主編此領域內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廣大的《美亞學刊》（*Amerasia Journal*）；日裔小說家山下凱倫的獨特寫作內容與手法早為批評家與讀者稱頌；黃秀玲多年從事亞美文學批評，出入於中英文之間，在文本閱讀與理論探索上頗為深入；韓裔批評家金惠經一九八〇年代初所出版的專書更是將亞美文學研究置於美國文學研究的版圖上，她對視覺文化及社會工作的投入也多受肯定；陳國維從社會工作者與社會史家的角度積極介入，多年來對華裔美國歷史及博物館的貢獻有目共睹；

日裔歷史學家高木羅納從多元文化角度所撰寫的美國歷史和亞美歷史不僅暢銷一時，而且長銷多年，並被改寫成美國中小學讀物，影響深遠。至於附錄的勞特雖然集中於美國文學（史）的重建與美國文學選集的重編，但他多年來投入多族裔的美國文學研究（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亞裔），與亞裔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密切合作，為亞美文學及美國文學提供了更寬廣的視野。

我由於因緣際會，有幸與這些傑出的人士進行訪談，事前的準備固然收穫良多，訪談中也得到不少啓發、甚至驚喜，謄寫、翻譯與修訂文稿時更是字斟句酌，反覆琢磨，務期善盡代言、再現之責。在這整個過程中，充分領會到讀書、知人、論世的效應，甚至與其中許多人發展出長久的友誼，日後再回頭閱讀這些作家或學者的作品時，不再只是白紙黑字的敘述、詮釋或抽象的理論，而是有個活生生的人物和世界在那裡。也盼望透過我的再現與代言和讀者分享。至於個別的過程互動，詳見各篇的前言。

時光飛逝，難以想像自己從事訪談竟然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之久，訪談的對象中也已有七人辭世——柯理格（1923-2000）、薩依德（1935-2003）、黃玉雪（1922-2006）、伊哲（1926-2007）、艾理特（1942-2009）、麥禮謙（1925-2009）、高木羅納（1939-2009）——後三人更是在本書校稿期間辭世，益發讓人感到人生之無常與因緣之可貴，更應善加珍惜，及時把握。

如果像福克納所言，「藝術家的身後都有一群惡鬼在追趕。他不知道為什麼惡鬼找上了他，通常也沒時間去思索其中的原因。……作家唯一該做的就是對自己的藝術負責」，那麼訪談者的處境則幸運多了。雖然他們在訪談錄中要關注

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必須對受訪者與讀者負責，卻絕非遭到惡鬼追趕。相反地，訪談者是與在該行業中表現傑出的人士、甚至智者為伍，不僅有相當充裕的時間去思索箇中原委，更有機會針對疑惑之處就教於受訪者，與他們深入互動，分享他們的知識、經驗與智慧。而身為代言人、再現者的訪談者，在為自己求知、解惑的同時，也可藉由訪談錄將個人的關懷與受訪者的回答公諸於世，分享他人，縱使未必知道這些訪談的效應如何，但或許某時某地某個有緣人能像帕慕克一樣，在其中得到安慰、鼓勵與指引。

單德興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台北南港

附識：本書能結集出版，首先要感謝各受訪者接受訪談，認真作答，除了哈金與湯亭亭兩篇書面訪談之外，其他多位也曾協助仔細修訂謄稿，以期更忠實、精準地傳達他們的意思。諸篇訪談能以現在的面貌出現，這些「合作者」（collaborator/co-author）居功厥偉。其中四篇是我以國科會訪問學人與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者的身分，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族裔研究系一年研究訪問期間進行的，謹向國科會與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致謝，也感謝黃秀玲教授的多方協助，讓我能在該系掛單一年，充分與師生交流，並運用該校及附近地區的豐富資源。除了陳國維那篇訪談之外，其他各篇都曾分別在《中外文學》、《思想》、《英美文學評論》、

《聯合文學》等期刊發表（其中哈金、湯亭亭、山下凱倫三篇的英文版且曾分別在 *Tamkang Review* 和 *Amerasia Journal* 發表），謹向廖咸浩、錢永祥、林載爵、黃宗慧、蔡秀枝、鄭順聰、蔡振興、梁志英等先生、女士致謝。在此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良好研究環境，以及李有成先生、何文敬先生、紀元文先生多年的支持與切磋，強勇傑、林雅瓊、呂潔樺、蔡雅婷、謝育昀諸位先生、小姐在不同時期的幫忙，尤其是陳雪美小姐和黃碧儀小姐長期協助蒐集資料、修潤文字、仔細校對。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先生的熱心支持更是本書問世的最大動力，特致謝忱。期盼透過這些訪談，讀者能分享到受訪者的知識、經驗與智慧，達到讀書、知人、論世的目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